

田彩仙

著

家族文化与魏晋文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華學人齊集

主 编：徐传武
责任编辑：王 军
装帧设计：丘西邻

ISBN 7-5059-3200-4



9 787505 932005 >

ISBN 7-5059-3200-4/I·2421

定价：15.80 元(全套 268 元)

田彩仙 著

家族文化与魏晋文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族文化与魏晋文学/田彩仙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华学人文稿/徐传武主编)

2000 ISBN 7-5059-3200-4

I. 家… II. 田… III.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V. 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529 号

书 名	家族文化与魏晋文学
著 者	田彩仙
出 版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发 行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6.57
印 数	0001—1000 册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00-4/I·2421
定 价	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蒋有恒老师书

田新仙

2001年9月

中

華

學

凡

文

高

目 录

内篇 魏晋文学家族研究

第一章 魏晋文学家族总论·····	(1)
一、魏晋文学家族形成的文化背景·····	(2)
二、魏晋文学家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8)
三、魏晋文学家族创作论略·····	(17)
四、魏晋文人家族内部的玄儒之争·····	(23)
五、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	(33)
六、从《世说新语》中的“童言智语”看魏晋家族文人的 早慧现象·····	(41)
第二章 魏晋文学家族分论·····	(51)
一、魏晋阮氏家族文化传统与文人心态·····	(51)
二、陆机、陆云诗文的客居游宦意识·····	(62)
三、东晋谢氏家族文化传统与谢灵运其人其文·····	(74)
四、从《世说新语》看孙绰其人其文·····	(83)

外篇 魏晋诗人与诗歌研究

第三章 魏晋诗歌的审美意识·····	(94)
一、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94)
二、论“悲音为美”·····	(104)

第四章 阮籍诗歌研究·····	(110)
一、阮籍诗歌重“意”与重“气”的美学追求·····	(110)
二、阮籍《咏怀》诗的意象组合·····	(116)
三、阮籍《咏怀》诗的“失路”意象浅论·····	(126)
第五章 魏晋文学现象散论·····	(135)
一、魏晋人名漫谈·····	(135)
二、阮氏文人之重情特征·····	(138)
三、“早年失怙”与嵇、阮之性·····	(140)
四、阮籍诗中的“剑”意象·····	(142)
五、嵇康为人之“真”·····	(144)
六、《兰亭诗》与琅琊王氏·····	(146)

杂 篇

第六章 中国文学散论·····	(148)
一、论宋之问诗歌在初唐诗坛上的创新意义·····	(148)
二、从宋之问后期诗歌看其贬谪心态·····	(156)
三、柳永词的悲秋意象·····	(163)
四、也谈柳永慢词的铺叙特征·····	(170)
五、学术功力的多方面展示·····	(178)
六、“虚静”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	(185)
后记·····	(194)

第一章 魏晋文学家族总论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从萌芽到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汉代的经学世家出现之时，世家大族便以读书传世，到汉末魏晋则出现了许多以文学创作为主的家族，这些家族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家族化创作时期。文学家族以其世代相传的家学渊源与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思潮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以家族中世代相传的文学创作经验与相近似的创作特色，为文学发展的链条增加了延续性，故而在当时乃至后世文学史上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魏晋文学家族形成的文化背景

（一）门阀士族制度的确立

首先，门阀士族的全盛是文学家族形成重要的文化背景，两汉实行经学取士，招致“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亦。”（《史记·儒林列传》）于是出现了许多经学世家。经学世家的形成，本是汉代昌盛时期，士族得以跻身于官场的重要条件，但到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士人深感报国无门，故而将“治国平天下”的念头融入“修身”“齐家”之中，家的意识比国的意识更为浓厚。同时，由于东汉的察举与征辟选官已开始看重士人的声誉与家世，到了曹魏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州郡大小中正皆由望族担任，九品的评定成为门第间权利分配的合法程序和门阀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保证。唐代学者柳芳在《氏族论》中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则更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许多冠姓大族累世公卿。如弘农杨氏，世称四世三公，皆以通经入仕；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子孙数十人至高官。由于家族观念的强化与国家观念的淡化，到西晋时“君臣之节，徒具虚名”，司马氏政权的建立是与世家大族的支持分不开的，故而西晋统治者对世族的政策一直是比较宽缓的，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正式规定了百官依品级高低占田荫客荫族的特权，使世族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更加

得到保障，世家大族无不致位通显，爵级公侯。故而门阀士族制度得以在西晋正式确立。西晋许多世族生活相当奢侈，何曾有时日食三餐，饭菜要一万或二万钱，还说“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财聚钱，不知纪极。”（《晋书·王戎传》）石崇和王恺斗富，则更成为千古豪奢生活的典型。东晋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期，东晋王朝不仅依赖于琅琊王氏等侨姓士族，而且也离不开江左士族的支持。“王与马，共天下”，便形象地说明了其时的政治格局。这种高门士族与皇权共治的情况几乎贯穿整个东晋时期。当然，东晋门阀士族地位的提高，还不仅仅是因其祖上的功绩，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当时在国家危亡时期对国家民族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们自身表现出的许多符合当时社会审美观念的品德优势。如王谢二族便是这方面的典型。王导作为渡江后的第一代丞相，在东晋朝廷与东吴大姓的联合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主动向吴地大姓请婚，学说吴语等。陈寅恪先生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谢氏家族的“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树立起了门第的威望。同时，王谢家族在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中体现出的既超然物外又出处同归的名士风度，也成为时人争相效仿的风范。门阀士族高居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他们垄断了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清要之职，占有大面积的土地，有免除赋役，荫庇亲属，收揽门生故吏，享受赐田，给客，给吏卒等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故而，门阀制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封闭性，为了防止士庶混淆，保持门第的高贵，士族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占据垄断地位，还要在文化上保持优势，于是，能够文才绍继便成为士族的理想。

（二）魏晋教育的家族化与家学的演变

其次，魏晋文学家族的产生，与魏晋教育的家族化是分不开的。汉末魏晋，因战乱频仍，统治机构不很健全，官学教育时废时兴，很不景气，大部分士人的教育以家族内长者亲授学业、耳提面革的传统模式为主，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这是“学术转入家内”时期。唐长孺先生说：“魏晋之学多仍家门传习之旧”（《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即是指名门大族中累世学业的相袭，由此形成了许多“家学”，也即家族文化传统，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子孙数代以家学相传；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吴郡陆氏也以“易”为家学，近人章炳麟《陆机赞》说：“机之祖始于陆绩，说《易》明玄，为经术大家。”陈留阮氏由于阮瑀曾为对王充《论衡》有很大兴趣的汉代著名儒学大师蔡邕的学生，故而阮氏后人阮籍、阮瞻等皆受其影响，可以说，《论衡》也成为阮氏的家学。“父子讲习以著专门之称，世家祖述以成传业之美。”（《册府元龟·学校部》）魏晋家学多承汉代余绪，大部分以儒学为主，但真正使家族得以延伸的是许多家族的“与时推迁”，即顺应时代的思想潮流，如到魏晋时许多家族由儒而玄，或玄儒双修，在一些著名的儒学家族中，开始出现了玄学之士，如颍川荀氏从荀彧的祖父荀淑始就为儒学世家，“淑博学有高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彧之叔父荀爽为汉之司空“幼好学，年十二，通《春秋》、《论语》，耽思经典，不应征命，积数十年。”（《三国志》裴松之注）荀彧本人也为汉末大儒，而到荀彧之子荀彧，家族中世代相传的儒学根基则有所动摇，《三国志》裴注引何劭为荀彧作传曰：“彧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彧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属而已。彧以此言善攸，诸

兄怒而不能迴也。”荀粲不仅认为“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而且认为“立德高整”的父亲不如“不治外形”的从兄，由此而在儒学世家诸兄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郡谢氏在西晋的世祖谢衡娴于掌故，通晓礼制，被时人称为“硕儒”，他的儿子谢鲲则是任诞放达、善于玄言的“中朝名士”，并因“折齿”而被士人传为笑谈，不仅一改其父风尚，而且开启了谢氏家族的玄学名士风范，使这种道家名士风范任诞风气在家族中源远流长。琅琊王氏之世祖王祥在魏晋之际以儒学发迹，而王衍却成为西晋的清谈领袖，到东晋时，王氏后代中绍继家风的著名政治家王导也玄礼双修，兼好佛释。不仅中原如此，江左大姓也有同样倾向，陆机、陆云为江左名门之后，陆氏世传儒学，二陆入洛之后也深受玄学影响，如陆机的《幽人赋》、《列仙赋》，陆云的《逸民赋》都充满了老庄气氛，对玄学贵无境界极为推崇。魏晋各大家族“与时推迁，自保家势，朝市革易，而我门第如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它们随时调节自己的思想，以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外界的挑战。由此而跻身于名士之列，提高了家族的声望，使家族文化传统得以渊源流长。

保全门第不衰和社会地位的高贵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头等大事，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途径是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个个成才，并入仕为官。《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的问话便代表了士族渴望诸子成才的典型心态。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特别注重对子弟的劝戒、说教，所以，“家训”、“家诫”类文章在魏晋时十分流行，象蔡邕《女训》，荀爽《女诫》、王祥《遗令训子孙》、王昶《诫兄子及子书》、嵇康《家诫》、夏侯湛《昆弟诰》以及谢混的《诫子侄诗》，这些“家诫”作品内容上主要为两个方面：一为对后代品行操守即仁义忠孝等道德上的教育，另外即希望后代

在经籍文章上能有大的建树，以光大门庭成为文章世家。“家诫”作品的盛行，既使家族因有良好家风而可源远流长，又促进了家族中文学创作的繁荣。

（三）轻武尚文的社会风尚

范文澜认为“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过武将及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中国通史简编》）汉魏一些世家大族也有武质出身，因战功显赫而跻身显位，由于汉代有以经学取士的传统，在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一些豪强地主出身的士族转向习经，渐变为经学世家，使其政治与文化地位得以巩固。而个别恃武而轻文的武力强宗，势必会渐渐衰退。可见，从汉代以来轻武尚文的风气便逐渐强化。汉末曹魏统治者曹操虽为宦官出身，为巩固统治，对士族也时有摧抑，但曹操父子对文学创作的倡导与实践却促进了纯文学的形成，并成就了许多家族中人从士人到文人的转型。如王粲的祖父、父亲都位至汉三公，而王粲在三国时则成为一时文杰；应场是颖川应氏的后人，其祖父应奉为汉代著名儒者，叔父应劭是《风俗通义》的作者，而应场及其弟应璩在三国时脱颖而出，不仅绍继世儒家风，而且以诗赋传世。西晋建立后，晋武帝的“偃武修文”也为文学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晋统治者虽不象曹氏父子那样以文名世，但西晋统治者对文人的宽缓的政策，则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崇尚儒术，并采取许多措施兴复儒学，但他在尊儒的同时并未“罢黜百家”，而是允许其它学术如玄学的存在和发展，故而使西晋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西晋文坛出现了“两潘”“二陆”“三张”等家族文人。东晋王朝的建立多依赖于中原冠族与江左大姓，“兵家”出身的人即使武功卓著，地位显要，也往往让士族中人不屑一顾。如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出身“兵家”曾为儿子向部下王文度的女儿求婚，王氏为中原大族，王文度之父王述便十

分不高兴：“兵，那可嫁女与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可见，魏晋时“轻武尚文”已成风气，许多武力强宗家族弃武从文，积极参与到士族的清谈品评活动中。可以说，武力起家的人如果不经由武到文的转换，一个家族很难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魏晋社会普遍注重文采风流，既讲求人的仪表、风度之美，又看重人的文学修养，门阀士族尤其重视文化教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从历史上所具有的文化地位来看，也主要是那些文化上占优势的家族，如曹氏、陆氏、王氏、谢氏等家族，这些家族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这些与当时尚文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

二、魏晋文学家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文学家族的形成不仅有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其内部的发展与演进轨迹。家族中前辈对文学创作的倡导与实践，后起之士的文才相继成为文学家族形成的必然的内部因素。到魏晋时，不仅有象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那样的文才相继的冠族大姓，也有如谯郡曹氏、陈留阮氏那样的中下士族因文才卓著而脱颖而出，成为此时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文学家族的发展与演进自有其一定的规律与阶段性特征。

文学家族在两汉时便已有之，如汉初辞赋家枚乘、枚皋父子，著名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东汉著名史学家、辞赋家班彪及其子班固，其女班昭，以及汉末蔡邕、蔡琰父女等。汉代文学家族一般为子承父业型的两代结构，而且家族中人也多以史书的写作承继为主，枚氏、班氏于辞赋创作方面颇有成就，但他们更看重的是辞赋用以讽谏的政治实用性，与纯文学的创作还有距离，而于诗歌创作，汉人则少有染指。值得一提的是汉末蔡邕父女的诗赋写的很有成就，已经开始了家族中纯文学的写作，这是文学家族的创作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标志。汉代在学术文化与文学创作上皆缺乏相互争鸣，相互交流，而于文学家族中交流更少。汉代的家族文化多依赖于国家机器的发展，汉代文士始终把家族命运与朝廷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认为国运是决定家族命运的主要因素。故而文学家族这一特定的个体在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中便不可能清晰地凸现出来。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随着统一的国家机器的分化，门阀制度

的确立与“文的自觉”思潮的涌现 出现了许多以诗文写作为主的文学家族，如谯郡曹氏、陈留阮氏、汝南应氏、颍川荀氏等。其中曹氏家族可以说是魏晋时期较为典型的文学家族，曹氏文人一直把文学创作视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策一》注引《魏书》）曹丕“雅好诗书文籍。”（《典论·自序》）“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兼该。”（《魏志·文帝纪》）曹植“少小好为文章”（《晋书·曹植传》）“为建安之杰。”（《诗品·序》）曹氏文人不仅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而且还进行文学上的交流，主要为同题诗文的写作与互为赠答：

（建安十九年）时邺同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曹）植援笔力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三国志·曹植传》

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命余兄弟并作。

——曹丕《登台赋序》

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伴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之赋》。

——曹丕《临涡赋序》

可见，曹氏已经自觉地把诗赋的写作作为家族文人出游之时创作的主要内容。这几次出游活动中的诗赋写作，均由曹操提议，并参与写作，除第一条记载中所赋诗文无以传世外，均有同题作品，如三曹共有的《登台赋》，丕、植均有的《临涡赋》。曹丕继曹操之后成为曹代家族中又一代领袖人物，由他提议，他与曹植均写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诗》等。同题诗文的写作，旨在锻炼家族文人的创作能力，体现家族文人创作的力量。